

回顧聖吳甦樂會在華百年史

聖吳甦樂會 麥蕾修女 (Sr. Ellen Mary Mylod, osu)

第一步：

在歷史的海洋中，一百年似乎只是時間之河中的涓涓細流，但對於那些慶祝百年歷史的人來說，這確實是一個滿載各種經驗的階段。準確地說，我們在中國和臺灣的百年歷史經歷並不是從中國開始的，而是肇始於加拿大東南部的一個小鎮。這個小鎮的名字是史丹地。聖吳甦樂會史丹地會院是在 1884 年時由聖吳甦樂會魁北克會院創建的，該會院則是聖瑪麗·閩雅 (St. Marie de l'Incarnation Guyart) 在 1639 年所創立。

史丹地鎮當時很小，現在也仍然不起眼，在十九世紀時，那裡只有幾座教堂、一所學校、幾家商店和一家銀行。最熱鬧的地方可能是學校，儘管它很簡陋，學費很低。修女們很貧窮，經常挨餓卻工作過度；即便如此，她們還是非常歡迎新加入者，其中 1897 年加入她們的歐瑪莎 (Marthe Audet) 是我們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她入會後的會名是「瑪麗玫瑰」(Marie du Rosaire Audet，後文將以「歐玫瑰修女」稱之)。她是家裡十六個孩子中的一個，六歲起就開始接受聖吳甦樂會修女們的培育，她的家與修道院相鄰不遠。她於 1900 年在聖吳甦樂會宣發初願，沒多久之後，覺察到內心中渴望去往傳教區服務的聖召，然而，在史丹地會院中並沒有辦法完成這樣的召叫。1906 年，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的歐朱莉總會長修女 (Mother Marie de St-Julian Augry) 訪問了魁北克和史丹地二所會院，這二個會院都不屬於在 1900 年成立的羅馬聯合會。歐玫瑰修女向她提到她渴望到非基督徒的土地上為教會服務，但歐朱莉總會長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她說：「讓我們向天主祈求，並耐心等待祂的時間到臨。」。她建議歐玫瑰修女等待，她也確實這樣做了，等待了十五年！

這段期間，在這個修院團體中，她發現另一位修女與她有著相同的渴望：來自英國的戴雅妮 (Agnes Davis)，會名是「十字架修女」(Marie de Ste. Croix Davis)，她於 1901 年入會；很快地，歐玫瑰修女與十字架修女分享交流她們想成為一名傳教士的渴望，儘管十字架修女的健康狀況不佳，卻仍希望能去往傳教區服務。

在這裡介紹一下未來聖吳甦樂會汕頭修院創始者中的第三位，可能會有助於大家理解。來自史丹地團體的葛朵莉 (Dorilla Guay) 也有一個不尋常的經歷：她的健康狀況一直很差，於是她特別向偉大的傳教士瑪麗閩雅祈求轉禱，這讓她因此擺脫了這種狀況，後來當她加入聖吳甦樂會時，就以聖瑪麗·閩雅的會名「降生瑪麗」(Marie de l'Incarnation) 做為她自己的會名「降生瑪莉·葛」(Marie de l'Incarnation Guay，後文將以「葛瑪莉修女」稱之)。

有進展了，但緩慢：

歐玫瑰修女，四十歲了，此刻她覺得不能再等待了。去往中國是她的目標，儘管在加拿大、

羅馬和中國之間，交織著複雜而令人難以置信的官僚機構和公文往返，但她對於自己的這個決定始終堅定不移。困難之一是資金問題。這三位修女去往中國需要一筆獨立的資金，史丹地會院卻不能承諾支應她們，既不能提供資金，也不能提供更多的人力。這兩種困難後來一直都伴隨著這個在中國相對短暫的福傳新使命。這裡要說一下，萬民福音部在紐約市的負責人費若瑟蒙席（**Monsignor Joseph Freri**），聽說了有可能在中國建立新的傳教使命，就寫了一封信給歐玫瑰修女，詳細列出關於她的計畫中的問題。她立即作出回應。費若瑟蒙席詢問在中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關於新的傳教使命可能可以座落的地點，也得知了在中國廣東省汕頭的實茂芳主教很歡迎她們在他的教區建立新的修會基地。但是，有一個很大的「但是」，主教為人直爽和務實，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對修女們的期待是什麼。他將會提供一個可以滿足她們的小房子，至於其他的東西，她們必須自己想辦法。歐玫瑰修女相信，只要能儘快申請加入羅馬聯合會，就可以解決她們的問題。同時，她也透過一切可能的方式從盡可能多的管道尋求她所需要的財務資助。

准予設立新會院的正式授權信在 1921 年 12 月 8 日收抵，但在 1922 年 1 月時，實茂芳主教似乎有了一些疑慮。他質疑她們維生及招募新成員的能力，也擔憂萬一傳教生活不適合她們時，她們將如何應付未來。拖延是不可避免的。費若瑟蒙席再次去信予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會長，後者也與實茂芳主教往返聯繫。在此期間，可以想見傳教士們心中的苦惱，因為對她們來說，啟程前往中國似乎本來已經是唾手可得的事了。歐玫瑰修女在自己一封信的空白處寫道：「考驗是天主在工作的記號。」

前往中國：

直到 1922 年 3 月，問題才基本解決，修女們可以開始著手忙碌的準備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與家人和朋友一一告別。新團體的職務在 6 月 15 日透過選舉產生，歐玫瑰修女當選院長，十字架修女是院長助理，而葛瑪莉修女則負責培育工作。6 月 19 日，唸誦完正午的三鐘經，她們離開史丹地會院的家前往蒙特婁，乘坐開往溫哥華的加拿大火車列車，然後登上被稱為海上宮殿的加拿大皇后號，開往橫濱（7 月 10 日）、上海（7 月 16 日）和香港（7 月 20 日）等地。她們在會見了實茂芳主教，並與沙爾德保祿會修女們共度幾晚後，於 7 月 22 日離開香港前往汕頭。

現實情況：

抵達汕頭後，她們面對的是現實。主教確實提供了一間小房子，裡面有三張用木板搭成的床，上面鋪著中國式的編織席，還有必要的蚊帳、幾把椅子以及一張搖搖欲墜的桌子。飯廳裡有一張較好的桌子和椅子，廚房裡有最基本的鍋子和其他用具。她們用最初幾天瞭解了新環境，但是完全沒有準備好應對 8 月 2 日來襲且幾乎摧毀了汕頭的大颱風。修女們在終於寄達史丹定的信中描述了這座城市的毀壞情況，她們自己則是與死亡擦肩而過（香港報紙報導說，颱風在汕頭及周邊地區造成了一萬多人死亡），以及她們為修復幾近摧毀的房子所做的努力。她們的信中還描述了中國人驚人的勇氣，許多人雖然窮困，仍悄悄地開始重整打理起他們的生活。

我們的修女們毫不畏懼，在十字架修女的指導下開設了一個小藥房以幫助那些最有需要的

人，同時開設了一個「聖嬰之家」(Holy Childhood) 分支，這是教會內的一個收容孤兒或棄兒的組織；修女們盡其所能地救援這些嬰兒，使她們免於罹患天花；她們能識別天花，但後來才意識到，這些嬰兒中有許多是被遺棄的，因為他們有染上麻瘋病的跡象。

1922 年 10 月 2 日，歐玫瑰修女開辦了一所得到主保諸聖天使助佑的小型小學。這是一個大膽的計畫，因為在她們三個人中，她是唯一能說流利英語的加拿大人。學生有 21 人，年齡和國籍各不相同，形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巴別塔」，但他們都想學習英語。有趣的是，她以天主經和聖母經開始幫他們上課，當他們一起背誦時，流利程度參差不齊。

實茂芳主教雖然比她們預期的更親切和慈祥，但他一再堅持她們必須有更多的成員。問題是這些人可以從哪裡來呢？至少就當時來看，應該是來自加拿大。於是他寫信給史丹地會院，然而那裡是不可能提供幫助的。我們前面已經提過，這個問題將在往後的二十年間一直伴隨著她們。

在羅馬聯合會內部：

11 月 9 日，她們把加入羅馬聯合會的申請書寄給了在羅馬的聖吳甦樂會總會，三人都簽了字。想像一下，當她們在 1923 年 4 月 23 日收到同意她們加入聯合會的消息時多麼高興，但這個同意有些預期之外的調整；鑒於她們的規模小，這個團體將附屬於爪哇會省（現在的印尼）。歐玫瑰修女接受了這個有一些缺點的決定，懷有不同想法的爪哇會省副省會長則寫信給她們要求提供更多關於她們擁有的資源和未來計畫的資訊。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在人數增加之前，她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未來的計畫。能否在加拿大為那些希望在中國服務的人建立一所初學院？這個問題開闢了一條思考的途徑。與爪哇會省溝通的一個良好結果是與在那裡工作的孟柏納修女（M. Bernard Mancel）有了聯繫，她也長期懷有去往中國工作的願望。

排除萬難在中國持續成長：

實茂芳主教仍然決心擴展他的傳教工作。因此，他把修女們帶到汕頭以北約三十公里的一座小城潮州府。十字架修女寫給史丹地會院的信中熱情地描述了這個地方。她說，使徒工作的各種可能性很廣：收容孤兒、聖嬰之家、建立中國貞女團體（為那些想在教區服務及講授天主教要理的婦女設立的一種女性團體），以及可能建立一所小學.....如果她們將要去那裡，她設想的是由她一個人去，讓歐玫瑰修女和葛瑪莉修女留在汕頭。不然她們還能怎麼辦呢？

在等待結果以及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緊張時，政治局勢的發展沒有佔據她們太多的注意力也就不足為奇了。關於可恨的滿清王朝倒臺前後席卷全國的強烈憤怒，在她們的書信中幾乎沒有任何敘述，她們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越來越多的軍閥想要推舉新的政治領導人。雖然實茂芳主教在一份寫給香港的報告中，多少抒發了他對時局發展的理解，特別是人們對外籍傳教士們鵲起的憤怒與怨憎，多數原因應說是他們咎由自取，只能說是來自於大家對汕頭知之甚微；傳教士們對於國家層面訊息的交流是貧乏的，他們所關注的都只聚焦在被他們照顧的人身上，

烏雲密佈：

聖吳甦樂會更關心的是如何培育三、四名渴望加入她們的年輕女性基督徒，可不可能在加

拿大成立一個培育中國籍吳甦樂會修女的初學院呢？因為顯然在汕頭成立的可能性太小了。有人建議歐玫瑰修女回到加拿大探詢一些可能性，不過後來是由十字架修女去了；十個月後她回來了，沒有任何關於建初學院的進展；沒有一個主教會願意考慮在這種不確定的年代裡，還在教區中增建這樣一個傳教基地。儘管如此，她還是帶回來一個希望，有二位年輕女性渴望很快就能成為來中國的傳教士。同一時間對汕頭會院有或多或少打擊的，是另外四名已承諾要來的傳教士沒有到來，其中兩名應該來自法國，另兩名來自南斯拉夫。甚而有之的是周圍各種迫害的威脅、布爾什維克叛亂分子入侵她們的屋宅、對外籍人士的仇視與敵意等等，所以當實茂芳主教堅持他想開設第三個傳教基地，地點在汕頭北邊約幾天船程的河婆鎮，這就更令人感到訝異不止了。1926年3月25日，一個新會院實現了，建立在絕美的環境中，也因為敵軍不願意深入到如此遙遠的內陸地區，她們得以享有了一段平安和諧的時期。十字架修女和兩位年輕的客家籍望會生對可能開展的各種可能性充滿熱情，但美好的夢想是短暫的。敵軍來襲中斷了這平和的日子，特別是在1927年1月之後，老百姓對外籍人士的仇視更是與日俱增，四處遍布著恐懼的氛圍。然而，儘管內戰和迫害充斥各處，傳教士們卻很神奇地並未成為被鎖定的目標。她們的孤兒院當時已有五十多個嬰兒，為教區培育要理講授女性傳教員的工作也很順利。同年10月，一位新的聖吳甦樂會傳教士從匈牙利的拉華會院被派遣而來；同時，經過汕頭會院幾年的初階培育，她們在12月8日歡喜慶祝了三位在本地宣發聖願的聖召：劉玉枝修女、蔡亞納修女和萬瑪莉修女。這真是黑夜中的希望之光。

然而，接下來的幾年仍然是黑暗的。如颶風般的軍隊入侵和破壞悲劇性地摧毀了汕頭地區，無數失去了一切的貧困農民湧入城市；修女們與實茂芳主教一起面對這艱鉅的任務，盡其所能地幫助她們；後來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們被安置在鄉村地區，修女們則開始評估將如何繼續未來的生活。大家一致認為，在羅馬的總會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情況，必須要有一些來自第一手的澄清，於是她們決定在總會邀請各會省省會長及各地院長蒞訪羅馬總會，共同慶祝總會長若望馬定修女發願銀慶慶典時，由歐玫瑰修女出席前往。1929年，她在加拿大和歐洲都充分利用了這個良機，不僅促成了在北美為中國建立初學院的希望，她也訪問了修會在義大利一些重要的地方，並與總會長深度交談。事實證明這很有用，譬如在加拿大或美國建初學院就不太有希望。其他重要事件包括歡迎五位新傳教士的到來，其中一位是吳甦樂修女，她將在我們的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從上海去到吳甦樂會法國波瓊西(Beaugency)初學院的初學生秦愛梅修女(Augustine Zing)也有進一步的好消息傳來，潮州府及河婆的使徒工作有所改善，增加了許多希望。然而，很遺憾這種狀態未能持續太久。可以想像一下她們所面對的苦惱，1931年12月，在潮州府年僅三十六歲、才剛宣發聖願不久的萬瑪莉修女宣告病危，歐玫瑰修女儘快趕到那裡，但沒有任何希望，萬瑪莉修女在幾小時內就去世了。她的離去留給了歐玫瑰修女更沉重的負擔，照顧著長久罹患乳癌卻無法施行手術、正緩緩離世的十字架修女，玫瑰修女與她分享著建院以來的種種，1932年3月，十字架修女離開了人世，留給歐玫瑰修女重任院長的重責大任，在若望馬定修女再次當選為總會長時確定了這個任命。此時國民黨的軍隊暫時戰勝了紅軍，遂有一段短暫的和平局面。

變化中的地平線上：

申露德修女(Marie de Lourdes Simons)在此際被任命為爪哇(含中國)會省的省會長，

她的第一個任命是讓來自爪哇的孟柏納修女(M. Bernard Mancel)擔任中國汕頭會院的院長。

她們二位在 1935 年 9 月的某天早上抵達那裡，孟柏納修女在當天下午就任。她對中國的情況並不陌生，她決定在潮州府及河婆二個會院派遣各自的院長代表，但由一位法定長上管理（她自己）。此外，她在爪哇及暹羅的學校工作多年，那些學校各方面都很上軌道，她借鏡這些經驗來理解中國的學校。在其他問題上，她確信中國的學校必須進行改革。一開始她試圖讓既有的學校招收付學費的學生，以平衡修會使徒事業的收支，這個作法遭到各方反對。然而，無論如何都必須採取一些措施，讓修女們能有一點微薄的收入。在她看來，中國固然是貧窮、遍地文盲和混亂，她和實茂芳主教一樣，覺得自己很清楚知道什麼是必須去做和能夠去做的，她將盡她所能去實現它們。

對於當地的各種問題，毫無意外地她似乎全無所悉，包括當前的政治局面、對外籍人士日益嚴重的仇視、儒家主義的強勢復興、以及感覺到汕頭和潮州府都出現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隨著工作的繼續，歐玫瑰修女在談到孟柏納修女時總是充滿敬佩之情，但並沒有向她傾訴心事。因此，當 1937 年 1 月她得到羅馬總會的許可，離開中國前往加拿大實現她的夢想，為培育中國的聖召成立一所初學院時，真是令人十分驚訝。

1938 年，孟柏納修女帶著秦愛梅修女到上海開始攻讀學位，因為總會希望中國籍修女們能準備好擔任長上的職務。沒想到的是，孟修女當時明顯得了重病，最終被診斷為胃癌，去到爪哇治療對她很有幫助；她是在那裡得到歐玫瑰修女過世於加拿大的訊息，玫瑰修女長久以來奔波於加拿大為中國傳教需求籌設初學院的工作以失敗告終。

改變帶來新生活（契機）：

令人驚奇的是汕頭會院夢想已久的晨星女中在各種困難中於 1940 年敞開大門招收付費學生了，接下來幾年裡，成功超出預期。1948 年 11 月，大家欣喜獲悉學校已獲得政府的正式認可。

1945 年，大戰結束，美國和加拿大的聖吳甦樂會開始提供許多直接幫助，但對人力的需求卻越來越迫切。1947 年，主教在提交給羅馬的報告中指出，汕頭聖吳甦樂會的幾所不同的學校中，共有約一千五百名學生。當時法國省會不可能派遣修女來華，但有三位修女從美國前來，在共產主義勢力日益強行進入南方的這個時候，她們的到來助益極大。1950 年後，所有的傳教工作都被終止，未來變得更加晦暗。而這一年也是晨星女中創校十周年，在她們 12 月 8 日慶祝周年慶的幾天後，12 月 16 日，當地共黨組織了一次嘈雜的遊行示威，秦愛梅修女被控訴並被監禁，其他人則被指控非法或不當對待學生。從 1951 年春天開始，幾乎所有的修女都離開了中國，或是被迫離開。吳甦樂修女設法留下來一段時間，盡可能地照顧秦愛梅修女的需要，但到了七月中旬，她也不得不離開了，這距離 1922 年傳教士首次到達汕頭已經過去了三十年。

然而，看似結束的事情實際上並非如此。正如《聖經》中的智慧之言：「結束意謂著開始」（In my end is my beginning），事實證明也是如此。感謝李緒珍（後來被稱為仁聆修女- Sr. Marie du Sacre Coeur）的暗中工作，秦愛梅修女在入監三年多後終於獲釋，途經曼谷、羅馬，

最後抵達法國的會院，與吳甦樂修女、一群也剛抵達那裡的中國初學修女（晨星女中過去的學生）快樂地團聚。她們一直都與那些從中國出來、多數在泰國尋求庇護的修女們保持著聯繫，分享她們重獲新生的希望和夢想。這種重生，在香港是不可能的，因為那裏已經非常擁擠了。那臺灣呢？

去臺灣：

後續故事輾轉展開：1958年8月18日，一艘來自香港的客輪駛入基隆港，船上載有4名聖吳甦樂會修女及一位打算與她們共度此生的年輕望會生。哪這些吳甦樂會修女們是誰呢？吳甦樂修女、秦愛梅修女、林綺雲修女和黃雪文修女。在碼頭上，期待她們來臨的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費聲遠主教(Bishop Verineux of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馬優神父，以及其他幾個人。主教已經為她們買好了車票，所以她們帶著大批行李，於20日出發前往東海岸的花蓮。她們被一側的崇山峻嶺和另一側的深藍色太平洋的美景所吸引。

沒多久她們就知道了許多受迫害或被驅逐的傳教士們也來到了臺灣，躋身於那大批隨國民黨政府到臺灣避難的中國人行列。1948年，臺灣有13,000名天主教徒；1954年，天主教徒已經超過32,000人；再僅僅十年後，人數就增加到265,500人，驚人的成長率達到73%。

我們的修女們在花蓮安頓下來後，沒有浪費任何時間。9月1日，她們開始在美侖明德幼稚園工作，一百個孩子擠在一間日式房子裡，由林綺雲修女在黃雪文修女的幫助下精力充沛地管理，而吳甦樂修女和秦愛梅修女（以下也簡稱奧斯定修女）則負責籌建海星中學。她們透過主教的幫助尋找建校土地，他也協助她們進行與政府間的各類申請。他是一個簡單、隨和的好牧人，做事不拖泥帶水，而且很欣賞聖吳甦樂會修女們的教育方法。

購買校地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接下來奧斯定修女發揮了她驚人的技能，從制定計劃、施工、採購傢俱乃至於組織董事會無一不能，而從聖吳甦樂會總會的檔案中留存的數百封信件可以發現，當時吳甦樂修女也正不知疲倦為何地努力到處籌措建校資金。初步計畫是建造一座兩層的水泥建築，兩棟平行的建築物在中間相連，估計費用約10,500美元。二樓將做為修院和學生宿舍，一樓則做為小學和初中的教室。

花蓮海星中學和若瑟小學：

1959年6月12日，臺灣花蓮的「私立海星女子初級中學」被臺灣省教育廳正式核准立案。學校奉准於9月2日辦理招生，不料一場颱風來襲打亂了所有的原訂計畫。儘管如此，修女們還是準備好在9月15日迎接她們第一批108位的兩班學生。1959年至1961年是聖吳甦樂會最艱難的兩年。修女們中只有林綺雲修女和秦愛梅修女是具備政府要求的教育行政管理及教師資格的中華民國公民；面對100名學生，人數還逐年增加，剛開始時外聘的教師很少，以致於修女們確實工作過度，也由於人手不足，她們必須隨時準備好接手學校裡任何有需求的工作。可以說，她們是無所不能的。

1959年11月，吳甦樂修女正式向修會申請開辦若瑟小學，學校以此命名，希望能承接它在汕頭前身若瑟小學的工作。1960年9月開學時有39名小學生，再次回到團體的喬琦修

女 (Sr. Jeanne George) 完全投身其中。這是花蓮的第一所私立小學，創辦它的唯一原因是為了服務窮人。年復一年學生遞增，到 1967 年已有六個班 216 人，1968 年有 235 人；事實上，這種成長率很正常。

聖瑪爾大女修會：

1960 年 3 月 1 日，費聲遠主教期待已久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即成立一個原住民的女修會，在他的教區中為原住民服務，他命其名為「聖瑪爾大女修會」，希望修女們能在基督內以聖瑪爾大為榜樣，為弱者和窮人服務。他邀請吳甦樂修女擔任她們的第一位總會長，並接受了 18 位申請入會的候選者。主教為她們建造了一座兩層樓的房舍作為她們的修院，並逐步增加房間，預計於 1964 年 5 月初完工。花蓮教區的神父們都非常讚譽這個修會，因為各地堂口都亟需人手協助。

隨著在法國接受培育的修女們返國加入她們，聖吳甦樂會在臺灣的人數逐漸增加。到 1965 年，她們的人數超過了 20 人，這與學校的逐年擴展相吻合。1963 年，海星中學增加了高中部，學生人數達到五百人，其中一百六十位是住宿生。同年，陳安琪修女和王曉風修女兩位從美國東省來到這裡，然而，當時這個團體通用的語言是法語，讓這兩位修女時感溝通困難。好在此時葛瑪利修女從泰國轉來，協助翻譯並傳授這二位新來的人一點法語，對她們助益甚大。

1964 年 8 月，總諮議會任命林綺雲修女為花蓮會院院長，好讓吳甦樂修女可以騰出手來做其他工作。與此同時，一些海星中學的畢業生已在教育界服務，其中一位是住在高雄的梁桂雲，有一次她遇到高雄的鄭天祥主教，鄭主教同時也是一位道明會會士；梁桂雲得知了主教想在高雄教區創辦一所女子中學，便向鄭主教描述了花蓮的海星中學和聖吳甦樂會；主教進一步瞭解了這個修會，並去拜訪了花蓮的吳甦樂修女；在親眼目睹這些後，他寫信給羅馬的聖吳甦樂會總會長，邀請該會在高雄創辦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學。高雄，可以說是當時臺灣南部一個繁榮的商業和工業重鎮，同時擁有全島最大的港口。

文藻外語專校，高雄：

在兩位總會諮議來訪後，總會向教廷萬民福音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Evangelization) 提出申請建校，並得到了批准。這所新學校將被命名為「文藻」，以公元 1674 年第一位被祝聖的中國主教之名命名，如同鄭主教，他也是道明會會士。依據當時正在召開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推動的本地化精神，學校的建設將採用中國宮殿式建築。校地購買和建設的費用幾乎全來自聖吳甦樂會總會，同時全球各會省也給予了一些幫助。

原初的計畫是創辦一所女子中學，但由於當時政府正在大力推廣五年制專科學校，因此原來創辦中學的計畫更改為創辦五專。但是，「五年制專科」到底是什麼呢？沒有人真正知道。選擇以外語教育為主，是因為教育部認為臺灣的確很需要外語教育；此外，由於天主教教會中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外籍神父和修女們，他們都具備合格的教學資格。

1966 年年初，總諮議會任命申露德修女為高雄會院院長和創辦文藻的雙重任務。學校預計在當年秋季開學，所以吳甦樂修女和蕭學璇修女等人住在主教為修女們在南華路安排的住處，

每週多次到建設基地，風雨無阻地監督施工。斐德修女和秦家懿修女當時並沒有實際的行政經驗，在申露德修女的親自指導下，被指派建構和闡明學校的教育理念、建校宗旨、組織章程、課程結構、教師招聘和其他事項等。當然學校規劃的主軸是以語言作為工具，期能成為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樑。

然而，任何新的建設都不是沒有困難的。秦家懿修女被重症所襲，不得不前往臺北接受癌症治療。由於缺乏經驗，新設學校的申請核准困難重重。好在得到幾位有經驗的神父們及熟悉政府事務運作的斐德修女父親王撫洲先生的幫助，官方核備的工作得以推進。建築方面的問題也很多，於是高雄團體決定打包起南華路的所有東西，搬到尚未完工的大樓三樓的一間教室裡住下來，如此讓營造廠不得不加快了施工進度，建築物的主體中樓終於在 7 月完工。

隨後，更多的問題出現了。斐德修女被修會任命為新學校的校長，但教育部在審查時認為她的資格不符，修會中也沒有其他合適人選，怎麼辦呢？這時斐德修女的父親出面，願意以他名義做為學校的官方使用，於是出乎預期之外地解決了所有困難。他的資格沒有任何問題；他具備豐富的官場經驗；之後的所有程序遂都順利進行；7 月 17 日，學校被正式核准招收 200 名學生。7 月 23 日和 24 日，730 名學生參加了入學考試，其中 185 人被錄取。學校決定建築物西側的一樓為英文科、法文科、德文科和西班牙科各班學生的教學空間，二樓做為行政辦公室，三樓為學生宿舍，修院則搬到中樓三樓。第一年聘任了充足的教職員工。9 月 24 日，在大樓的入口大廳舉行了第一次的開學典禮，由王撫洲校長和擔任董事長的高雄教區主教主持。學校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 1980 年時文藻接受了教育部的建議，開始收錄男生。教育部確信，鑒於臺灣當時國家發展的需求，年輕男性和年輕女性都必須熟練外語。

在臺灣的聖吳甦樂會從區會成長為省會：

由於當時修會在臺灣已經有兩個會院團體了，於是同年 8 月 6 日，她們正式成為修會中的一個區會，由申露德修女擔任區會長，直屬總會管轄。她們的使徒事業涵括花蓮的若瑟小學、海星中學、以及高雄文藻女子外語專科學校。1972 年，林綺雲修女接替露德修女擔任區會長，是第一位本國籍聖吳甦樂會會士擔任這個職位。

現在必須提到的是臺北會院，早在 1975 年，林綺雲修女就為在輔仁大學中文系就讀的丁福寧修女提供了一個給修女居住的家，位於大學後方，非常方便；這棟房舍由三座相連的兩層小屋組合而成。不久之後，它同時也成為區會所在的辦公室，對其他培育中的讀書修女們帶來很大的便利。八年後，臺北團體搬到臺北市劍潭，為台北教區管理那裡新建的堂區教堂及其附屬的女生宿舍。

隨著區會中三個團體會院的建立，這份報告必須篩選出我們的歷史中被認為是重要的項目，其中之一就是關於我們如何從修會中的一個區會到成為一個省會的歷程。另一方面，為實現這個目標，區會諮議們開始與羅馬的總會諮議們協商溝通，另一方面，又在為這一改變做必要的準備。1984 年 5 月 5 日，根據第 33/84 號法案，總會長批准成立中華省會，於 1984 年 7 月 16 日正式生效，蕭學璇修女被任命為首任省會長。

然而，在我們成為一個省會之前，也經歷並接受了另外一些種變化，其中之一是幾位修女

離開了這個世界。在台灣的聖吳甦樂會成為省會之前，一生奉獻給天主的申露德修女，完成了天主召叫她做為羅馬聯合會總諮議以及臺灣和文藻的工作後，於 1984 年 2 月 5 日安然離世。9 月 20 日，追隨她而去的是秦愛梅修女，她終其一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為中國和臺灣的教育事業服務。她曾在中國被痛苦監禁了三年多，卻從未有人聽過她為此抱怨。1992 年 12 月 10 日，受人尊敬的吳甦樂修女因骨癌在花蓮去世。她從 1971 年開始全身心投入聖瑪爾大女修會，一直到 1985 年都擔任她們的總會長；回應聖瑪爾大修女們的請求，她安葬於她們修會的墓園中。其他幾位在數年中陸續離開我們回到永恆天鄉的修女們還有畢莉珊修女、湯淑嫻修女和柏聘納修女，留給我們對她們無盡的追思祈禱，以及對她們忠信服務的回憶。1994 年的一件喜事是修會在台北金寶山安樂園為我們離世的修女們購建了一座墓園靈骨塔，每年的 4 月 5 日清明節前後，教區都會在那裡奉獻一台追思感恩祭典，為亡者的靈魂息止安所祈禱。

還有一些陸續離開中華省會的其他修女們，包括彭澤熙修女、穆安欣修女、巴倫修女、以及喬琦修女，尤其是這位最後提到的喬修女，多年來她一直是海星（若瑟）小學的中流砥柱，她的回法國安養令大家極為不捨。

新的使徒事業：

當然，時光流逝的另一個後果是，衰老。隨著修女們年齡的增長，她們無法繼續被學校聘用，於是開始開發其他類型的使徒工作。當蕭學璇修女在 1990 年結束了她的省會長任期，她開始探索「人格九型」靈修輔導工作的可能性，她與瑪利諾女修會的柯德蘭修女合作，一起以這種靈修輔導方式幫助了許多人，因而備受讚揚。另外有幾位修女在聖心會深山厚子修女（Sacred Heart, Sr. Atsuko）的協助培訓之後，以聖依納爵神操為大家提供避靜的靈修指導工作。在二岸政策開放後，陳安琪修女投入「橋樑教會」的工作，在許多領域中提供了長達 18 年的出色服務。同時她也協助「安琪之友」的發展成長，這個由文藻教職員組成的團體，肩負了傳承吳甦樂教育精神的使命。

修女們從正式的教職崗位退休後，省會逐漸有財務上的問題需要考慮。經過討論後，省會決定這三個會院團體歸屬於同一個財務系統，這要歸功於具備相關專業背景的陳昭德修女。這個系統在各方面都運行順利，既務實，又很屬靈。

與基督服務團合作：

現在似乎是時候來簡要介紹我們與基督服務團（CSC）的合作，這是一個由許多具專業背景的天主教平信徒組成的團體；該團體當時正在分辨他們該如何在教會的使命中積極行動與參與，而李文瑞教授是該團體中非常活躍的團員。同一時間，斐德修女還是文藻的校長，她對台灣教育政策在整體教育發展上的影響深感憂慮；強化三校董事會似乎是解決這局面的方案之一。1994 年，斐德修女在研究了各種可能性之後，聯繫了李教授，探問基督服務團與修會合作的意願。從 1995 年到 1996 年，雙方舉行了多次會議和討論，最後終於決定了五位基督服務團團員加入董事會，他們都具有高等教育或產業領域的專業背景。李教授則完全投身於文藻，擔任了九年文藻校長，期間的貢獻難以一一枚舉。斐德修女和李教授也讓這二個團體（修會與基督服務團）一起創立了樂銘文教基金會，借重李教授之前在台灣大學的經驗，團結雙方的力

量來共同強化幾所學校的發展。文藻的教職員工很快就發現李校長的完全投入工作，他特別關注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也積極升級校園各種設備。他所做的一切備受讚譽，當然也不得不說，有時他的要求還真讓人害怕。

國際化：

中華省會也不斷在發展中，尤其是在國際化方面。非常有趣的是，這也牽涉到三所學校。我們在花蓮的小學和中學，英語教學都很有活力和技巧，因此，常常會有外籍訪客的訪問安排，這激勵了學生對知識的汲取，也引發了他們對其他文化的興趣。至於文藻，因著與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在專業上的連結，多元領域的知識與文化活動也逐年倍增。

中華省會的另一個進展是推動了亞洲地區各省會之間的關聯性，這來自於那時的總會長梅澤斐修女大加鼓勵的一個活動。這個會議第一次舉辦是在 1977 年，地點為高雄，與會代表來自印尼、泰國、印度和日本，整體來說，這場會議被認為在宗教與文化上都相當成功。當時也決定，這個會議將由各省會輪流主辦。2002 年，又輪到中華省會第二次主辦，這一次增加了澳洲省會的代表，所以大會更名為「亞太地區」的會議，視野也更加遼闊了。2007 年修會的總代表大會呼籲修會應當要「跨越藩籬」(Go Beyond the Borders)，這個呼籲啟發了亞太地區的省會合作，一起在柬埔寨建立了一個基地，協助無家可歸的兒童及在街頭浪蕩的年輕女孩們，他們顯然很需要被照顧和關注。2010 年，在多方研究與討論後，羅馬聯合會的省會長們共同簽署了一些合作文件，這個新團體屬於總會管轄，於當年 9 月 29 日正式啟動。團體在 2015 年開辦了「吳甦樂學習中心」，後來發展成為一所幼稚園，現在已經成為了「和平之母小學」(Mother of Peace Elementary School)。

展望未來：

在結束這篇簡述聖吳甦樂會中華省會的誕生與發展的文章時，必須提到一個國家層面的現象，因為它無疑地影響了我們的未來發展，即出生率的急遽下降。針對其影響，各個面向的研究與分析都在進行中：移民問題、國民經濟、就業，以及隨之而來的教育問題，各級學校的未來等等。大家很早就意識到臺灣的學校已經太多了，多過於現有兒童和年輕人的受教需求，尤其是私立學校。有些學校因為辦學成功而得能滿足它們的招生需求，當然不會願意退場，除非被迫；許多天主教學校屬於後者，它們長期為弱勢者服務，然而，這些家境不太富裕的家長們卻越來越多地轉向費用要求較低的公立學校，我們在花蓮的吳甦樂學校或多或少也遭逢這種情況。同樣的狀況會不會也是文藻未來的烏雲？目前學校的招生仍能平衡收支，然而，學生的程度，尤其是大學部的學生程度顯然逐漸低落。我們這幾所學校的負責人都在面對這些似乎無法克服、解決的問題。

為幫助我們釐清問題並給予面對未來的勇氣，有一些關於吳甦樂精神與教育的書籍很能派上用場，其中一些書已經翻譯成中文了，包括由奎其洛·馬松尼博士(Querciolo Mazzonis)出色的著作：《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一位女性先驅-聖安琪梅芝及聖吳甦樂會》、孟逸修女(Sr. Irene Mahoney) 對於 1951 年前聖吳甦樂會在華傳教史的卓越敘述等

2019 年的聖吳甦樂會的總代表大會召喚我們成為一個「邁向新生活的全球團體」，回應這

個召叫，並思考臺灣聖吳甦樂會的未來，我們不能不想起修會在汕頭的最後歲月，看起來那像是一個結束，然而事實證明，對臺灣的聖吳甦樂會而言，那正是一個看不見的肇始；這是天主的計畫，願光榮歸於天主和祂的教會。

在我們的未來，多麼需要忠信與勇氣，這正是我們的會祖聖安琪梅芝在她的《勸言》序中的提醒：

要行動、前進、相信、奮鬥、希望、全心向祂呼喊，毫無懷疑地，你們定會見到奇事。

謝謝大家的聆聽參與。